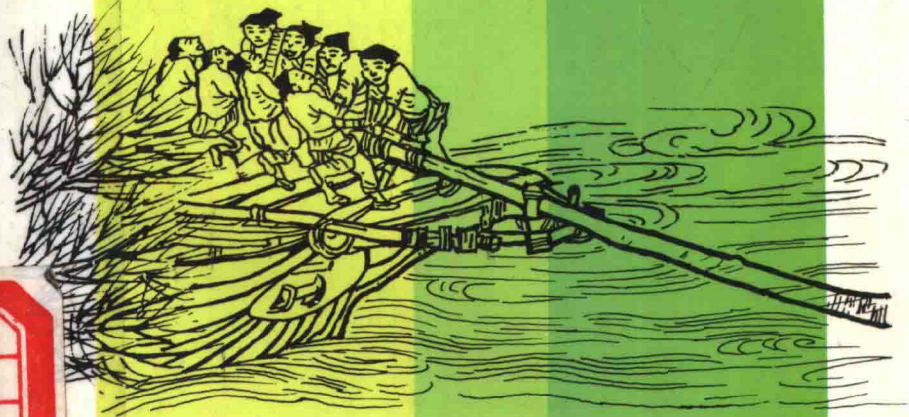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

〔日〕志村良治 著 江蓝生 白维国 译

ZHONGGUO ZHONGSHI YUFASHI YANJIU



中华书局

序

志村教授多年研究汉语语法史的成果出版了，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本书第一部分《中世汉语的语法和词汇》曾作为中国文化丛书第一卷《语言》的一篇，刊行于1967年（东京·大修馆，以下称“前稿”）。我读后感到，由于他充分把握了这个时期的语法史的全貌，才能写得这么好。正如志村氏自己所说，这篇东西受到王力《汉语史稿》和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的启发，但其他语言史学家的意见，凡是应该吸取的，也几乎毫无遗漏地采纳了，并非只是择取其要。本书题目中的“中世”一词，志村氏前稿里称为“中古汉语”，指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末（公元220年——905年）的一段时期。文章准确地记述了这数百年间汉语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许多新的词语（可以认为这些词语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口语）的语义及用法（语法功能）的特征。尽管其中有些前代（所谓上古汉语，即中国的古典语）已经出现，但其语义和用法大不同处甚多。而且这些词语可以说相当于后世（即近代汉语）大部分词语的祖先，在那其间也发生了变迁，跟唐代及以后时代（宋元以后）的词语和用法大不相同。这些问题作者也都注意到了。另外，作为这个时期含口语成分较多的资料，志村氏选择的是《世说新语》《游仙窟》和变文，不仅精密地调查了这些资料，并辅以其它资料中所见之旁证。文中几乎到处都嵌有志村氏的新发现，但由于篇幅限制，省去了详细的考证和说明。我在对此略感遗憾的同时，寄热望于将来。

我的希望不久就得到了满足。汇集起来构成本书第二部分的七章，其原稿曾作为申请学位论文向京都大学提出。我有幸和同事的诸教授一起读过。文中对前稿的一些问题做了十分详尽的解说。其考证绵密谨慎，诸多问题的结论都大体妥当，并无使读者感到不放心的奇僻之说。在审查过程中也指出了著者二三处失误，但这不过是小小的瑕疵，无损于本书整体的价值，同事们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授予他文学博士的学位。

此后，著者毫不放松地继续进行这一方面（汉语语法史）的研究，第二部分里所附的一章（第八章），只是其成果之一端。推想他把这一部分作为附录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乃是讨论现代汉语常用的授与动词 *gěi*（写作“给”）的原始形态近似于 *gui* 音，其起源远在汉代已见，详细记述从那时直至近代这一漫长时期内其用法的变化过程，远远超越了本书标题所说的“中世”的范围。这正表明著者关心的范围很广。*gui* 的字形从汉代起写作“饋”，从而对经书里出现的“饋”的字音所做的考证，又使我们足以窥见作者在汉语音韵史方面的造诣的深度。

另据著者来信，本书全部进行了改订修补，我想我们从前讨论时提出的疑问可以完全消除了。我对作者谦虚的态度不禁深深地敬服。相信高明的读者一定会充分认识本书的真正价值。

昭和 58 年 8 月（1983 年）

小川环树

前 言

——关于研究方法

提出中世时期的语法加以特别研究的目的,不用说,是把它作为探求整个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一环。另外还有一点,我希望由我本人把本书第一部分(一)所述中世时期种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详细地记述下来。其间,笔者基本的研究方法如下所述。语法研究,本应是首先探索各种方法论的一个领域,史的研究方面,也期望今后由比较多的研究者乃至有组织的团体来从事种种的探索,这是很必要的。

某一语言现象在何时、如何产生的?在什么时期、什么情况下,凭借什么样的历史契机而出现的?其样态因为什么而具有特色?还有,在历史的发展中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特别是中古时期经过了什么样的阶段?把上述各项作为观察问题的基点,力求把握各种现象的真实情况,是本书的一种尝试。这种方法追求时间的纵线,即以历时的研究方法为主轴。当然,这条纵线直贯现代汉语,必须把它跟现在活着的语言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这种与现时的比较,在本书字面上虽不多见,但我总是把它作为考察的基本手段而予以重视的。

语言现象是经常变化的,因而某个语言现象跟那一时代的其它语言现象是如何变化的应同时进行研究。在广泛搜集各种语言现象的实际状况时,追求时间的横线,就成了所谓共时的研究方

法。本来，应该先用共时的方法考察某一时代的全部语言现象，在此基础上再用历时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往往不能观察到某个时代语言现象的全貌，因而现在行得通的办法是，力求在有限的资料中，调动一切手段，来探明各式各样变动着的语言现象及其内在的变化规律。

以词汇问题为例，看看时间上横向与纵向的关系。

词汇领域也应具有相当严密的结构和各个时代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层次关系，但其相互限制和对立的情况不易看清，它不能像音韵学中各个音素在音韵关系上整齐对应那样清楚地显现出来。但是，词汇也有相互间的限定和对立，理应能够确定它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找出这样一条原则是十分必要的。某一时代的词汇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对词汇作共时的考察时，自应将此内容考虑在内。另外，即使是共时的研究，也不要扩展到那个时代的各方面，而应该只限于某一地域，进而探讨如何把它同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根据方言因体系不同而带来方法上的差异，探求方言内部构造上的特色和变化，在紧相连的前一时代或紧随其后的推移期内选择共时的断面，沿着时间的纵线，对这一方言内部的构造，分门别类地进行比较研究，这是适宜的方法。

这些方法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很重要，但在具体地运用这一方法时，尚有种种困难。比如说，唐末西北方言，根据敦煌资料可以了解到某种程度，但同一地方早些时代的资料或同一时代周围地区的资料，特别是南方方言的资料就难以寻找，等等。但是上面说到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是在科学地记述问题时应经常顾及的方法。

下面，讨论笔者认为应该重视，并在专论的若干篇章里使用到的方法，即把词语的形态变化跟音韵学和音韵史的变化互相对照进行研究的方法。

语法学通常分为造句学和形态学两部分，一般说来，造句学研

究词和词组怎样构成句子,形态学研究的是用词缀与合成等方法构成单词、及其构成方法的体系与词形交替变化的体系。这方面与音韵学的关系很重要,词汇的变化每每同音韵的交替变化有重要的关连。这一方法,即把词汇的变化同音韵史的变化相联系进行研究的方法,笔者在各处都使用了,特别是第二部分专论中对“甚麼”“恁麼”的研究,就是依靠这种方法取得的具体成果之一。

形态学的研究,在研究词汇方面尤其重要,笔者所重视的,是在形态和意义的关连上有关类别与类推的作用。从词的构造方面对词语产生时发生独特的类推这一汉语的特色加以分析、记述,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关于这种类推作用,索绪尔曾提出“联想场”的概念(《语言学原理》小林英夫译,岩波书店,1940年3月,PP·215—231)此后乌尔曼把它发展成为联想关系的四部类说,即从意义间的联想和形态间的联想这两种基本类型出发,各自又分成两类,形成联想关系的四大类:意义的类似、意义的接近、形态的类似、形态的接近。此外又加上这四种类型中的几种情况同时起作用的复合类型(乌尔曼《历史词义学研究现状》,收于《语言和意义》,池上嘉彦译,大修馆,1969年6月,PP·334—343)。

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词汇研究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汉语。比如起源于以往对于汉语词族的构想(B. Karlgren,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 M. F. E. A. 5, 1933),以语音为主轴,以字形为辅助手段,将词族划分类别并进行分类的方法(在日本可参照藤堂明保氏《形态基的研究》,中国语学 109 号,1961年4月)等等。汉语里词的孳生、类推、混淆乃至类别和分组的情况,作为意义和形态的基本分析方法,今后有进一步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记述的必要。

本来构成“联想场”的词汇的互相关系是多层次的,而且,这不

只限于词汇方面,也涉及到语法方面,索绪尔提出的是语义场(semantic field)上的“联想场”,观察汉语的联想、词族等方面的独特方法,实应加上音韵学的推论,经过古文献资料的验证,才能做更进一步的探究。况且,联想不止于词汇方面,也涉及语法方面。本书就纵予连词,尝试进行从词和词之间的联想与类推向词的复合、派生的形式发展的研究。在语法方面,注意到“把字式”和“被字式”的密切关连,再加上“使役式”,三者复杂地相互关连的问题。这是表明汉语里联想的方法的一个好例子。当然,还必须经常从这些联想与变化中探索某种规律性。举例说,即使是从来被简单地看成没有什么意义的词缀而受到轻视的词尾,以它作为纽带,产生出活的类推现象的情况也不少。这时可以说,派生形式中的那个词缀,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意义,以词缀为纽带,使派生词定型化,便具有排除不规则性的倾向。作为词汇史整理方法的一种尝试,在专论中提出了“~生”这一派生形态。这种做法应用于其他的复合、派生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好方法吧。

另外,在语言的联想、类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新词,受新旧时代或方言间的影响,当然交错不一,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把前面说到的联想的四种基本分类援用于汉语,看它们在汉语里如何自成体系,如何产生新词,如何交替,或者说,词汇群是怎样进入竞争状态,旧的词语怎样被淘汰的。对这些加以考察,就形成了专论中对于“从渠”的论证。

本书用“中世”一词题名,行文中也经常使用,这只是笔者暂定使用的名称,在第一页中有说明,这里说的“中世”大致相当于一般所说的“中古”时期。还有,文中说明时使用的语法用语尽可能采用接近实际情况的说法,避开特殊的术语。笔者自己对汉语语法存有许多疑问之处,尚在反复摸索的阶段,还没有达到形成一个统一体

系的地步。姑且使用比较平易的用语，如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助词、连语、形态素等，尽量排除容易混淆的用语，注意针对具体的情况加以说明性的记述。不消说，这不单是汉语的体系化问题，也是我今后要努力解决的课题。

又，音韵方面的注音依据下列诸书。

上古音据《上古音韵表稿》（董同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廿一，民国 56 年 6 月刊）

中古音据《中古汉语的音韵》（平山久雄《中国文化丛书》①〈语言〉所收的声母、韵母音值表，1967 年 11 月）。又，唐·五代西北音据《唐五代西北方音》（罗常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民国 22 年）的罗氏注音。又，汉藏对音据 W. Simon “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s” (B. S. O. A. SXXI, part 2, London, 1958) 的注音。

婆罗门文字转写《罗什译金刚经》据 F. W. Thomas “A Buddhist Chinese Text in Brāhmī Script” (Z. D. M. G, 1937) 的罗马字转写文。其他，如《朴通事谚解》的注音等，只用一部分的特殊注音，随文加注说明之。

目 次

序	小川环树
前言——关于研究方法	1
第一部分 中世汉语的语法和词汇——概论	1
一、中世汉语的时代划分	3
二、新的变化	5
a) 复音节词的增加	5
b) 四六基调的确立	7
c) 口语的反映	8
d) 破读	13
三、使成复合动词的形成	16
四、把字式——宾语提前	17
五、被动式——兼语动词“被”的确立	19
六、使役式	21
七、疑问表达的发展	22
八、关于系词“是”	24
九、名词	26
十、人称和称谓	31
十一、数词和量词	34
十二、指示代词	40
十三、疑问代词	42
十四、动词	44

十五、补助动词	53
十六、形容词	68
十七、副词	71
十八、连词	89
十九、介词	93
二十、词头和词尾	94
二十一、助词	95
第二部分 专论	101
“这”和“那”——中世新的指示词体系	103
中世汉语的疑问词系谱	144
a) 疑问词“底”	144
b) “甚麼”的成立	159
使成复合动词的形成过程	212
关于动词“著”——从它的原义和破读到使成复	
合动词化及补助动词化	242
指示副词“恁麼”考	268
说连词“从渠”——唐代的纵予表现	289
论词缀“生”——词汇史研究方法论试探	303
附：“与”“馈”“给”——从中古到近代的汉语授与	
动词的历史变迁和“给”的北京音的来源	316
后记	387
译者后记	390
词汇索引	392
引用书一览	438

第一部分

中世汉语的语法和词汇

——概论

一、中世汉语的时代划分

这里所说的中世汉语的时期，指从魏晋至唐末五代。与此相应，以汉末与北宋初年为参考时期。通常把这一时期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这种划分法最早由高本汉(B. Karlgren)氏提出⁽¹⁾，相对于“上古汉语”的“中古汉语”的提法，现在几乎被普遍使用，因而在本文行文中，除了“中世”之外，也使用“中古”这一术语。把中世时期进而一分为二，一般以六朝为中古前期(220—617)，唐代为中古后期(618—906)。而且前期又可以晋的南渡(317)为区分点，再加以细分。举例说，南朝乐府或史书记载中反映南方方言的词汇(“侬”和“底”)的出现等。由于这样一些区分在汉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成为必要的手段⁽²⁾。把唐代再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大致已被认可。以安史之乱(755—761)为界，中唐以后语言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敦煌资料，特别是变文的出现等等重要事件，就出现在这个时期，音韵史方面也被认为有很大变化。以上各个朝代的名称在文中说明处也根据需要而称为六朝期、六朝末、唐初、唐末、五代等。

汉语史上的中世时代，或称“中古汉语”，就整体而论有其自身的统一性，相对于它前后的时代，可以说显示出被充分认可的特殊性。就这一时期极有代表性的语法特点来说，就可以马上举出复音词汇的增加，系词“是”的产生，使成复合动词的形成，用介词“把”“将”使宾语提前，用“被”字表现被动，词缀的发达，即词头“阿~”、词尾“~子”“~儿”等的产生等等。这些是同前代的上古汉语

有明显区别的特征,同时,作为近世汉语中发达的各种倾向的先驱,近世汉语中也多少保留着一些中世的要素。中古汉语意外丰富地包含了现代汉语仍通用的语言现象的主要点,在音韵、语法、词汇各方面,都可以找到不少现代汉语的祖型乃至原型,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古汉语形成了汉语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注

(1) B. 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yde, stockholm, and Gotembourg 1915~26. 据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中国音韵学研究》,民国 29 年 9 月,21 页,划分为“太古汉语”(le proto-chinois 诗经以前),“上古汉语”(le chinois archaïque),“中古汉语”(l'ancien chinois 六朝·唐代),“近古汉语”(le chinois moyen 宋代),“老官话”(le vieux mandarin,元·明时代)。

在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 1957,上册第一章,做了如下划分:(一)上古时代(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入侵中国以前),(二)中古时代(从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的前半期),(三)近代(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四)现代(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这里大体上从王力说,但笔者暂将中古时期的下限定在五代。

(2) 划分时代问题,本身难点很多,下面列举其中几点。首先,虽然叫作“中古时期”,也只是暂定的权宜的划分,它始于何时,止于何时,难以严格地确定。史的划分必须根据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进行,但绝非容易做到。汉语的发展尽管受到社会发展、朝代交替的影响,但也并非完全相对应的。汉语的历史具有词序方面少有变化而在词汇方面变化甚多的特色,它的发展历史从全体上讲是渐进的,但也有突然的飞跃。在音韵体系的变化方面,主要是前汉未到六朝时期的变化难以弄清。在把握语法、词汇的变动方面,不易掌握其发生质变的实际情况。以上种种全是问题。如果对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仅仅作为权宜之计的话,这种皮毛式的分法,哪一种都可以。然而这种态度恐怕不足取。我们还是应该科学地记述汉语发展史的内部规律,解决时代划分问题。到那时,对暂定的一个个时代划分内部的精细的规律性的描写,就会自然而然地

为某种合理的汉语史的分期、为比较科学的分类提供依据。

二、新的变化

a) 复音节词的增加

作为这一时期语言层可以成为对象的是书面语,但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反映口语的新文体、新形式,词汇、语法方面也呈现出种种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复音节词”作为语言单位明显化了。

复音节词的增加从前代(特别是后汉末)开始就可以看出来,对此必须考虑到国家社会的大变动、音韵变化及其它背景。声母、韵母的简化尤其与复音节词增加的现象有关,对此,有必要从《切韵》的音系出发推定六朝初期的音韵。另外,由于同音词的增加,需要用声调的变读来排除意义的混同,还有,由于复音节化使得音节表达更加缓和等等。当然,也不可忽视由于文化的发展,科学知识的进步,分析的概念也进一步发达这一方面。在其根底,还存在着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变化。比如数量词方面表现出相当高度的类别倾向(下述 33 页)就是一例。作为语言现象来说,以复音节词为单位,使表达明显地和缓起来,可以说始于中古时期吧。中古时期的语言现象由于受资料等的制约,考察起来本有困难,况且那些语言现象又形形色色,极为复杂。

袁家骅等编的《汉语方言概要》第三章里说,调查中古时期的语法状况的方法之一是利用汉代扬雄《方言》或《尔雅》的郭璞注。例如:《方言》卷一:“虔,儇,慧也,……楚或谓之蒯。”(郭璞注,“他和反,亦今通语。”)这告诉我们,汉代某一地域的方言,在晋代已成为通语。《方言》卷五:“杞,宋魏之间谓之渠擘。”(郭璞注,“今江东名亦然,诸猪反。”)这记述了北方方言传到南方的情况。通过

跟注相对照，我们得以了解到一个词古今的变迁，在北方的传播，波及于南北，词义的发展等等。尤其是晋的南渡这一历史大事件发生于中古初期，使得南北的交往更加紧密。本书在“甚麽”项下论述了疑问词“底”在乐府、诗文中的出现，也是跟南方接近的结果之一例。

“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选精切，除削疏缓。”（《切韵》序）“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同前）的论述反映出对南北音的差别的注意，但具体所指则难以了解。颜之推也有同样的说法：“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颜氏家训》音辞篇）陆德明接受这一观点，“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经典释文》序）特别强调南北方言间的显著差别。作为跟《方言》郭璞注相同的方法，比如在同一中古期内部，拿《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选）跟唐人的注、李善注、五臣注相参照，就可以进行研讨。《文选》相对来说是中古时期最为可靠的资料，它的注也是比较靠得住的资料。特别是五臣注对原诗、原文的解释里经常使用复音节词，可以对照看出到了有唐一代复音节词汇增加的情况。

六朝时期，汉译佛经盛行，译文中也大量出现复音节词，显示出佛家不拘泥于传统的雅言而大量使用当时的口语词汇的迹象。但是，从语法上看，其中也出现了许多不符合汉语传统的不规则的说法。关于这一点，入矢义高氏早已注意到。比如“尔时世尊，而说偈曰……”（魏译《大无量寿经》下）这里的“而”应作“乃”，但却多用“而”（参照 43 页）。“二乘非所测”（同前）的正规说法应是“非二乘所测”。佛经里出现的复音节词的急速增加，是如此超乎寻常，这是在一种自由的不拘传统译法的基础上大量产生的。在政治、社会的

变动，音韵的变化等复音节化现象的诸种要因中，这种佛经汉译法也有很大关系。

b) 四六基调的确立

第二个变化是以复音节词为单位，确立了四六的基调。骈文就建立在四字、六字的基调之上，舍去骈文绮丽的外观不谈，把它底层潜在的四六基调作为问题提出很有必要。因为连乍一看似乎正相反的《世说新语》中，已经可以看出同样的以四六为基调调整文句的倾向。所谓基调，是指在表达的时候有意在四字、六字后给一间歇的总括作用。这就是以复音节词为单位，表达的时候有意以四字或六字等偶数句作为音节上的间歇，使表达在形式上归于整齐划一，这就是总括作用。

“管公明言，与裴使君、何邓二尚书、刘太常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昏不假寐。自此以还，殆白日欲寝矣。”（《世说新语》赏誉）“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谈不辍。弟子中或有惰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也。”（唐写本世说新书）这是随意举出作为参考的二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用四字、六字统一全文的意识。关于这种总括作用，有进一步细加体会的必要。如果对四六基调再加深究的话，它是以 2：2 这样的复音节词为基本单位形成节奏的惯用化进而确立的。

现在试把《礼记·大学》的原文跟郑玄注对照来看一下。

“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对此，郑玄注云：

“於止，言鸟之所止也。就而观之，知其所止，知鸟择岑蔚安闲